

前思后量

施亮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前思后量

施亮 著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思后量/施亮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153-0327-7

I. ①前… II. ①施…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8852 号

责任编辑:万同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404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4.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2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

录

第一辑 文史谈屑	1
古代的城与市	2
古代的流氓	5
古代的体育运动	8
西晋王朝的奢侈腐败	11
晋代文人中的美男与丑男	13
闻鸡起舞两壮士	15
陶渊明的情操风范	18
一代雄笔陈子昂的悲剧	21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24
北宋的“城市革命”	27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30
蒋兴哥的启示	33
晚明的士风	35
傲兀的女人	38
桃花扇底叹兴亡	41
梨洲先生	44
布衣史家谈迁	47
薛宝钗这个人	49

载沣的晚年	52
晚清北京城中的一场械斗	55
 第二辑 艺文杂俎	 59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	60
南北朝的骈文	63
《世说新语》的清绝风韵	66
明代的小品文	69
飘逸倪云林	72
元代画家黄公望	74
孤傲狷狂一布衣	77
石涛的画	80
八大山人	83
扬州八怪	85
清代怪诞名士郑板桥	88
李渔与“芥子园”书店	91
中国报业第一人	94
藏书家李盛铎	99
再谈李盛铎	102
民国报人邵飘萍	105
开辟草莱的出版家	108
现代藏书家傅增湘	111
林语堂和《论语》半月刊	115
唯美主义诗人邵洵美	118
 第三辑 知味知音	 121
古典小说中的酒	122
“王家菜”逸闻	125
油条与豆腐脑	127
北京的饭馆	130

北京的传统糕点	132
北京的仿膳小吃	135
二荤铺与烂肉面	138
北京烤鸭在美国的一场风波	140
罗斯福与鸡尾酒	143
咖啡趣谈	146
野蔬食趣	149
吃零食	152
饮茶的异化	154
吆喝的艺术	157
闲话琉璃厂	159
北京的旧书肆	161
余叔岩与余胜荪	164
梅兰芳与昆曲	167
影视与心理小说	170
小说·诗歌·音乐	172
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里	174
第四辑 文坛忆往	177
钱先生的一块表	178
我见到的汪曾祺	181
随顾学颉先生学古文	184
诗词名家陈迥冬	186
哲人的逝影	190
一棵雪松	193
今之君子韩少华	195
美国所“三剑客”	198
想起一套丛书	201
关于黄皮书	203
《围城》的旧版本	206

书生情缘	209
《战争风云》中译本的最早版本	212
从黄皮书到畅销书	215
《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	219
后 记	224

第一辑 文史谈屑

古代的城与市

“城市”一词是近代才使用的。中国古代典籍则较少地将城与市连用在一起。杜甫虽然在《征夫》一诗中云：“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这里的城市，未必是现代城市的含义。可以说有城而少市，毋宁称城邑或城堡。那时的城，深刻打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型烙印。如西周的城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周天子宫殿及政权机构所在的王城，二是分封诸侯居所及管理机构所在的都邑，三是贵族士大夫居住的食邑，城中建筑物及城墙高度按等级都有森严规格，不可僭越。城中的底层居民大多是统治者们的奴仆或官营手工业者。那些工匠的生活劳作无异于奴隶，甚至后代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必须世代继承父辈的专业。他们制造出的产品绝大多数不能以商品形式出现，只是无偿交纳的贡品。他们有时还要为贵族殉葬，被残忍地杀害。直至春秋时代，城中开始出现一些市场气息。在靠近城门的地方设有民间交易场所，对交易商品的经营范围，统治者也有极细密的规定，《礼记·王制》中记载，不仅“圭璧金璋”等被认为妨害王侯贵族威严的许多贵重物品不得交易，甚至“衣服饮食”也全都“不鬻于市”。但是，随着时代的大变动，统治者越来越无法阻止城与市的合一，在各个城邑中市的功能增强了，城市迅速扩大，城市平民阶层也出现了。例如，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的人口已经有 30 万了。

如今荧屏上出现许多反映汉、唐朝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可其中大多对古代城市场面的描写完全脱离历史事实,作者的艺术想象力未脱当今城市生活色彩。比如,当时的贵族官吏根本不可能与平民百姓混杂一处。城中一条大道,除皇帝及随从队伍,任何人不准行走。城内的居住区则分为闾右与闾左。闾右靠近宫城,是达官贵人们的住宅,屋宇巍峨,朱门庭深,歌舞喧天;闾左则在城门附近,居住的是普通平民,茅屋连片,肮脏潮湿,臭气熏鼻。城内市场管理非常严格,筑有高墙,四门有执鞭的胥吏监视,每日定期开放,击鼓为号。市场内的摊位布局,允许上市的品种,甚至商品的物价等都由胥吏说了算,而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几乎与犯人同伍,受尽了歧视。在唐朝还有规定,四品以上官吏不许进市场。《朝鲜金载》中记叙,京城四品官员张衡在退朝回府的路上,肚中饥饿,就在市场买了一个刚出笼的蒸饼,骑在马上举饼大嚼,未想到却被一位御史发现后参奏,当政的武则天即下令,再不许他以后晋升三品了。可以说,那时的封建统治者特别重视抑商政策,牢牢把握市场不放,对市场进行严格的控制。他们担心市的发展,会冲击到城的统治。

我仔细欣赏过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绘画《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整幅画卷犹如一首乐曲,由轻柔的乐段始,几经跌宕,层层起伏,至热烈的高潮终止。画卷开端是恬静的郊野风光,村落依稀,林木丛丛,乡人赶驮运的骡马到城里赶集。画卷中段,以横跨汴河两岸的拱桥为落笔集中处,展开描绘汴梁城的繁盛景象,艚公逆水行船,纤夫在岸上艰难前行,还有推车、挑担、赶脚的人们,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这些人穿街入城,画卷也进入高潮阶段。官府宅第,酒楼茶肆,店铺民居,鳞次栉比;仕工商农,男女老幼,摩肩接踵;真是工笔传神,精致而微。据说,南宋时期的临安城,这幅画的摹作复制品在杂卖铺的售价已经高达一两银子。而张择端的原作亦成为历代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对象。这幅画卷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真实反映了北宋以来古代城市生活的巨大变革,城与市开始紧密结合,随着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应当具备的功能也趋于完善,市民生活日益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

据一些学者研究,自从北宋的“城市革命”后,坊墙毁弃,街市融合,一扫唐朝以前古代城市的森严封闭,古代城市的发展也由此走上多元

化的道路。比如,有国都、陪都之类的政治城市,也有居于战略要地的军事城堡;这一类型的城市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来带动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的商品流通,往往被控驭于官僚的垄断体系之下。再有,就是江南新兴的多功能综合城市,以及镇市之类的经济城市,这一类城市较多地依靠民间的商品生产及市场流通,虽然对官府也有依赖性,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两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趋向,自宋朝始至明、清时期更为显著。尤其明朝中叶后,江南地区工商业迅速发展,两种类型城市的文化风格也越来越截然不同。一种是“城”的文化,宫廷森严,王府豪宅,京昆梨园,书店画铺,富有政治与文化特色;另一种是“市”的文化,幽坊小巷,酒馆歌楼,花山香阵,南货北味;见著于经济与市井风俗。这大概就是京派与海派文化的古老源头吧。

古代的流氓

五十岁以上的人,可能还记得鲁迅的一篇文章《流氓的变迁》。那是“评《水浒传》运动”中,毛主席推荐给全国人民读的。鲁迅在此文中分析,流氓的起源是所谓的侠客,其实骨子里也是充满奴性的。他对不赞成招安的李逵也并无好感,说李逵劫法场时乱砍乱杀,这正是游民的特性。民国初年,近代学者杜亚泉先生认为,游民阶层是过剩的劳动者,无劳动地位或从事不正当劳动,他们与过剩的知识阶层一部分联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特色”。

近代才有“流氓”一词。据《松南梦影录》记载,清末年,“租界无业游民群聚不逞,遇事生风,俗谓之‘拆稍’,亦谓之‘流氓’”。这也是游民阶层变迁至近代的最终命名。一本书中曾有考证,秦汉以前,古籍经典已有“氓”、“氓黎”、“氓隶”的字眼,意谓“流亡之民”,也算游民阶层形成的起始吧。先秦时期,这些人又被称为“赖子”、“恶少”。《荀子》中说:“夺攘苟得无耻者,谓之赖子。”“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可谓恶少也。”秦汉以后,“少年”一词有着特定的含义,与当代完全不同,并不是一个年龄阶段的称谓,却是非良家子弟及莠民的贬称。例如,恶少年,间巷少年,淫恶少年,轻薄少年等。至隋唐,仍然沿用“少年”外,又称这些游民阶层为“无

赖贼”、“闲人”和“妙客”。历仕四朝的唐宰相李勣,原是瓦岗农民军中一员,他坦承自己年少时是“无赖贼”,“逢人便杀”。“闲人”也是那时对流氓的专称,一直沿用至今。而“妙客”则专指在妓院内打杂、保镖和拉皮条等做下贱生计的人。

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所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有个观点,认为中国游民文化的形成大约在宋朝,那时才有大量的游民产生。我很赞成他的看法,因为在北宋的“城市革命”后,许多城市由封建化的军事城堡向商业城镇转化,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城市,他们无正当劳动地位及生活来源,若想在城市中存活,也就只能不务正业。宋代称这些人为“捣子”,意谓“捣鬼之子”。他们对社会有很大破坏性,必然是历代官府打击的对象,他们也被迫不得不与统治者作对。可是,他们内心深处所崇尚的“义气”,仍然未脱旧的伦理道德桎梏。《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里,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像“浪子”燕青是卢俊义的仆人,可他风流潇洒,武艺高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也是个“少年”或“闲人”。梁山泊头领派他去找妓女李师师,以便打通皇帝的门路接受招安,也真是别有深意。所以,李师师虽然撩拨他,只因李师师是皇帝的情人,燕青竟然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毫不为之所动。自唐朝始,这些“少年”都喜好在身体“扎青”,即文身。而《水浒传》的好汉们也多有此嗜好,如“浪子”燕青、“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等人,连贫穷的阮小五也在“胸前刺着一个青郁郁的豹子”来。《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于元明之际,描写的社会生活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其中一些称谓更有元代色彩。蒙古贵族统治中国后,对农业曾经造成极大的破坏,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求,却重视半奴隶半官营的手工业发展。当时北方的大都与南方的杭州商业经济很繁荣,都市有了更多人口,市民阶层迅速扩大,产生了说话、歌曲、傀儡戏等各种市民文艺,其演变而产生了元杂剧(元曲)。更多的破产农民流入城市,也使得游民阶层更为庞大,元曲作品称这些人为“泼皮”、“无徒”、“地头鬼”和“绰皮”。例如,《窦娥冤》中的泼皮张驴儿父子,作者就点明是此一类流氓恶霸人物。而且,当时还有一些特殊的游民,他们大多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倚仗自己为统治种族的游民资格,对汉人和南人敲诈勒索,横行不法。就连忽必烈对此也很头疼,还专门召

集了四个蒙古大臣讨论这个问题。

明代初期，由于开国皇帝朱元璋本人就是游民出身，深知其破坏性，便通过各种律法限制打击游民阶层。如《皇明条法事类纂》中记载：“有等凶恶之徒，三五成群，持仓场收放以为营生，号为搂扒，或称为光棍，或作为小脚等项名色。”这是游民阶层变迁的一大特点，他们努力使自己不再“游”和“流”了，因而转化为了地痞。他们有的欺行霸市，把持码头，强行敲诈；有的开设赌场，设局行骗，聚敛钱财；也有的包揽讼事，勾结官府，行霸一方；也有的为妓院保镖，拉皮条，代贼销赃，行使假银等。自清朝以后，明朝遗老的反清势力也开始利用游民阶层，由此组成“洪帮”。流氓的帮会也注意组织化、秘密化了，“青帮”与“洪帮”两大派系流氓会党直至民国时期仍然有极大影响力。不过，流氓的结社，也是古已有之。如，宋代扬州的“亡命社”，元代的“清乐社”和“扁担社”，明初的“铲头会”，这些都是小的会社组织。从流氓黑社会的组织性来讲，古代远远不如现代。

古代的体育运动

人类的远古社会并无军民之分，凡青壮年都要奔赴战场。农事闲余，人们围聚一处，时常复习演练战争中各种格杀、角斗动作。日久天长，还汇入某些娱乐性的杂耍动作，这就是民间早期的一种体育运动形式。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角抵之戏，实际上是一种摔跤活动。以后，随着该运动形式的流变，又称谓角力、角觚、摔胡、相扑等。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漆绘于木篋上的秦代角抵图，将其再与东汉画石像上的汉代摔胡图作比较，可以看出该项活动已经有了较大变化。据《日本书记》载，日本的相扑就是中国唐代中晚期流传过去的，从中可见唐代角觚之戏的历史影像。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记载：“（蚩尤氏）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觚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筋。汉造角觚戏，盖其遗制也。”看来这种具有纪念蚩尤性质的“角抵之戏”，也是再现部落战斗场面的原始舞蹈。这种原始舞蹈形成于春秋时代，秦朝沿袭下来。西汉初年曾经禁止过，但其仍在民间流传不绝。汉武帝提倡尚武精神，又恢复了“角抵之戏”，并引入宫廷成为一种娱乐活动，还附以乐器伴奏。至隋唐之际，城市生活日渐繁荣，“角抵之戏”也演变成“百戏”中的一种。由双方简单的争斗与竞技，改变为有着特定故事情节，经演员化装表演，集舞蹈和乐曲为一体的早

期戏曲。这种戏曲经过发展,为宋元杂剧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提到“蹴鞠”,“蹴”是用脚踢之意,“鞠”是指一种球类,它是用八块橄榄形皮子所缝制的圆囊,中间用毛绒塞满,实心无弹性。踢玩之时,人们排成一行,互相用脚传递,仿佛是一种兵阵,嬉戏与训练兼而有之。《汉书》也几次提到这项活动,而且至汉代踢法又有所改进,专门在地上挖一深洞,再把球踢入洞内,谓之“蹋鞠”。据说,西汉大将军霍去病颇善此技。“蹴鞠”之术至唐代,又发展为“蹙鞠”,也称击球。球类不限于皮子缝制,也有木头制成,用棒子来击打。击球包括步球和马球两种。唐代人最喜击马球。诗人韩愈曾描写过比赛击马球的场景,我们也从一些文献记载及古墓壁画中可推测得知竞赛的方式,马球场一端竖有两根木柱间嵌有木板的球门,木板下部开一圆孔为球室。参赛的两队骑士人数相等,服色不一,马尾巴绾成结,防止缠绕球杖。骑士左手执缰,右手握一根长约数尺的球杖,上端如偃月形,双方策马疾驰争击一个“状小如拳”的木质彩球,将球击入球门之下的球室为胜。马球是中国传统体育竞技活动,曾盛行于唐代,以后各朝沿之,而至清代则趋于衰亡。到了两宋时期,人们开始踢有弹跳性的气球了。这种气球用猪或牛的尿脬“纳气而胀之”。玩球规则是众人围一圈,用脚踢球互相传递。球在何处落地,那人便是输者。《水浒传》第二回描写宋徽宗近旁的奸臣高俅,原本是浮浪破落户子弟,只由于“最是踢得好脚气球”,就被看中收为亲随,以后竟被提升至殿帅府太尉之职。可以说,高俅就是因为善踢球之术才发迹的。

拔河也是一项古老的体育竞技活动。据《墨子·鲁问》和《荆楚岁时记》中所载,这项活动起源于春秋后期楚国和吴国舟战时,名匠公输般为楚国设计的一种名为“钩强”的器具,战胜时可钩住敌船,使其难以逃脱;失利时则能抵住敌舟,让其难以接近。后来,这样的战术操练又从水上转移到陆上,演绎为一种集体角力竞技项目,操作之具也由箴绳取代了战器,箴绳长度竟达“绵亘数里,鸣鼓牵之”,可见场面恢弘热烈。唐中宗和唐玄宗尤其喜爱这项活动,因此拔河迅速发展为全民性集体角力竞技项目。此时,长达四五十丈的大麻绳已经取代箴绳,麻绳两头分系数百条小绳,两拨人比赛时都拉住小绳在胸前绾成圈,以便于发力。而

且,竞赛规则也与现代的拔河并无二致了。

中国古代体育活动时常是运动性、竞争性、娱乐性及技巧性融汇一体的,而且注重娱乐成分,不太强调它的竞争性和运动程度。比如秋千,原是北方少数民族传进中原的体育活动,用来练习身手矫健轻盈,汉武帝则将此作为了专供取乐的后庭之戏。还有汉代的“都卢寻栋”,实际就是“缘竿”,即爬竹竿;以及“舞绁”即走绳等技巧性较强的项目,又演化为杂技表演了。其实,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专制文化所决定的,这些活动流入宫廷及官场,为适应帝王后妃和达官贵人生活消遣需要,自然也就更看重其技巧性与娱乐性了。